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7.01.009

# 农户参与维度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惑

张俊

(安徽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之惑是当前乡村治理难题。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户参与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不高,处于基本满意水平。村务信息开放度与真实度对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生产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不显著;政府与农户共同作为决策主体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最大,并且对基础设施服务以及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对农村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总体满意度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农户参与维度

**中图分类号:**F3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6X(2017)01-0073-09

##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果,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核心命题。近年来各级政府不断增加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扩大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供给,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并未显著改进,<sup>[1][2][3]</sup>这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待解之惑。农户作为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对象,具有表达公共服务需求偏好、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管理的权利,但在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主导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农户实际参与比例较低。<sup>[4]</sup>因此,研究农户有效参与的维度不仅对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果问题,而且对于农村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农户对某项公共服务的预期效用与实际感受之比,预期效用来自于农户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强度,实际感受来自于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消费收益,包括农户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净收益以及消费过程获得公正认同的体验收益。当农户对农村某项公共服务的实际感受大于或

等于预期效用时,将产生较高的满意度评价,反之,满意度将会下降。因此,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测度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果的主要指标。<sup>[5]</sup>目前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其一,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朱玉春等基于西北五省的农户调查发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较高;<sup>[6]</sup>郑卫荣利用浙江省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总体及单项满意度不高。<sup>[7]</sup>其二,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经验考察。李燕凌、曾福生的研究发现,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农户个体因素、村庄因素以及公共服务价格与供需缺口;<sup>[8]</sup>朱玉春等认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公共服务供给农民参与情况、农民对村委会的评价、农民对政府的评价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显著。<sup>[9]</sup>此外,Olken 以及 Beath 等发现直接民主以及普遍投票机制是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显著影响因素;<sup>[10]</sup>廖媛红的研究发现,村庄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显著。<sup>[11]</sup>可见,农村

收稿日期:2016-1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1BJL039;16BJL107)

作者简介:张俊(1969-),男,安徽舒城人,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政政策与劳动力流动研究。

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在不同收入层次的农户中存在差异。<sup>[10]</sup>

就上述国内外研究来看,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是鲜有文献考察农户参与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农户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受益对象和供给满意度的评价对象,农户参与不仅是农户可行能力的扩展,可以扩大农户在公共服务消费过程中的体验收益,而且在公共服务决策、融资、资金监管、项目生产与管护成本等方面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单方供给的不足。<sup>[11]</sup>二是已有研究主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因子分析、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sup>[5][6][8][9]</sup>其影响因素的设定具有较大主观性,导致研究结论缺乏稳健性。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围绕农户参与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本文给出了一个理论分析和经验证据相一致的框架。已有文献主要是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sup>[11]</sup>农户参与基础设施供给意愿、<sup>[3]</sup>农户参与和乡村治理方面讨论,<sup>[2]</sup>并未考察农户参与如何影响公共服务供给效果问题。二是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现有研究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过于笼统、抽象,具体的公共服务项目评价较少,本文从农户可及性、可识性的角度,设计了四类22种典型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作为农户的评价对象,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使本文的结果更有代表性。

## 二、理论假设

农户参与是指农户自愿、主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的决策、筹资、生产、实施、监管以及评价等一系列经济行为,由于农村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与消费过程的非排他性,如果农户参与成本较高、参与渠道不通畅、主体性地位虚置、公共服务的公正性缺失,那么农户、政府以及各类乡村组织之间难以达成利益共识、平等共识、信任共识,农户的理性无知、理性忽视以及搭便车行为将会放大,结果是农户的参与意愿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参与行为。因此,农户有效参与必须具备三重维度。其一,村务信息的开放度与真实度。在农村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户参与面临协调成本、沟通成本高的问题,如果可以低成本分享公共服务的供给信息,将会降低农户参与成本。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信息开放度越

高,农户参与度越高。<sup>[12]</sup>不仅如此,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信息真实度越高,农户与村委会之间、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才有激励了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而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信息越了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户多样化需求的一致程度越高,则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其二,决策参与的广泛度。对于政府来说,扩大农户参与空间,促进农户、政府以及各类乡村组织之间达成利益共识,及时回应与协调农户的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决策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对于农户来说,参与公共服务决策既能表达自己的呼声,又能培育自身的公共理性,扩展自我提供部分社区公共服务的能力,<sup>[13]</sup>也能从决策参与中感到被尊重和认同,从而获得较高的愉悦感和满足感。<sup>[14]</sup>因此,农村公共服务决策参与的广泛度越高,农户有效参与的可及性越高。其三,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村干部作为政府行政意志的执行者和集体经济组织的代理人,自身也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如果村干部在农村公共服务组织与实施过程中廉洁履行职责,办事透明公正,那么农村公共服务的公共性与公益性才能获得农户的认同,农户、基层政府以及村干部之间才会产生较高的信任度,农户参与才能获得稳定和乐观的预期。<sup>[15]</sup>此外,村干部职务行为的透明度上升,有利于降低农户对村干部行为的私下质疑与游说,减少农户的不满动机。<sup>[16]</sup>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村务信息的开放度与真实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2:农村公共服务决策参与的广泛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假设3: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

## 三、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现状

### (一)研究设计

本文选取农村基础设施服务、农村生产服务、农村社会服务以及农村惠农政策服务四大类22项农村公共服务,这些公共服务是农户能够可及与感知的,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基本满意”、“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表示对每项农村公共服务的评价,分别赋值为20分、40分、60分、80分和100分。假设每类不同项目对农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赋

予相等的权重,得出每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均值,然后对四类农村公共服务进行平均加权,得出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得分。

##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4年7—9月对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的调查,之所以选择安徽省,是因为该省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发源地,也是中部地区的农业和农民工大省,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依据分层随机抽样原则,课题组分别从皖北、皖西、皖南、皖中、沿江地区抽取1个县进行入户调研,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05份,其中有效问卷290份,有效率72.5%。信度检验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0.75,表明问卷能够被接受。从调查样本的性别特征来看,男性占67.6%,女性占32.4%。从样本的年龄分布来看,20岁以下占5.6%,20~30岁占18.4%,30~40岁占23.6%,40~50岁占39.6%,50岁以上占12.8%。从样本的婚姻状态来看,已婚样本占79.8%,未婚样本占20.2%。从样本的受教育程度来看,文盲占2.8%,小学文化程度占26.3%,初中占40.8%,高中(包括中专)占

22.5%,大专以上占7.6%。从样本户的家庭特征来看,3口之家占22%,4口之家占33.1%,5口之家占27.9%,每户家庭成员的均值为4.34人;人均年收入为11348元;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5.01亩;有效灌溉面积为3.94亩。从样本户的外出务工情况来看,没有外出打工占38.6%,外出务工占61.4%。从样本所在乡村的地理区位上,城郊型乡村占21%,集镇中心村占34%,偏远型农村占45%。

## (三)四类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评价

调查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见表1。(1)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满意度均值为65.53分,处于基本满意水平,其中农户对小型农田水利、农村电网改造以及农村饮用水工程选择“满意”的比例均低于50%,农村饮水工程满意度最低,均值为60.62分,这一结果与朱玉春等的调查结果相反。<sup>[5]</sup>(2)农村生产服务的满意度均值为56.07分,介于不满意与基本满意之间。其中对农技推广与培训不满意的农户比例占41.52%,满意仅占9.34%,均值为51.48分,在所有调查的农村生产服务中满意度最低,这一调查结果与李冰冰等<sup>[2]</sup>的调查结论基本一致。(3)

表1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

	农村公共服务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基本满意	满意	非常满意
农村基础设施服务	小型农田水利	2.41	14.83	37.24	42.07	3.45
	“村村通”道路	2.77	10.03	25.95	52.6	8.65
	农村电网改造	3.10	16.21	36.21	42.41	2.07
	农村饮用水工程	4.48	21.38	41.03	32.76	0.34
农村生产服务	农技推广与培训	7.61	41.52	39.10	9.34	2.42
	农业灾害防治服务	2.07	28.62	50.69	17.24	1.38
	农产品信息服务	4.14	30.34	46.90	17.93	0.69
	农业小额贷款服务	6.55	27.93	40	23.45	2.07
	种养业政策保险	3.10	27.59	48.97	17.24	3.10
农村社会服务	农村义务教育	1.03	13.10	26.21	49.66	10
	农村公共卫生防疫	1.72	22.41	50.34	23.79	1.72
	生活污水处理	20.34	40.34	31.38	6.55	1.38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1.03	14.48	31.38	46.55	6.55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1.39	15.97	46.18	34.38	2.08
	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2.55	20.07	42.34	32.12	2.92
	农村文化娱乐	8.28	37.24	37.93	15.17	1.38
农村社会治安	1.03	17.24	50.34	30	1.38	
农村惠农政策服务	“一事一议”政策	9.82	27.72	45.96	16.14	0.35
	粮食直补政策	2.41	9.66	26.90	49.31	11.72
	退耕还林政策	2.76	22.07	50.34	23.79	1.03
	购置农机补贴政策	1.72	16.21	36.55	37.59	7.93
	农村土地整理政策	3.10	20.69	52.41	21.03	2.76

农村社会服务的满意度均值为60.9分。其中农村义务教育的满意度最高,均值为71.24分;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满意度最低,仅为45.62分,不满意的农户比例占40.34%,非常不满意的农户比例占20.34%。对于当前的农村文化娱乐服务,满意度均值为52.91分,不满意的农户比例占37.24%,非常不满意的农户比例占8.28%。农户反映基层政府很少回应农民的文化娱乐需求,既缺乏对乡村文化娱乐设施的投入,又缺乏对农民文化娱乐消费的引导,致使宗教迷信、赌博等在乡村蔓延。此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及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满意度得分都在60分以上,表明这三项社会服务效率的改进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4)农村惠农政策服务的满意度为62.46分,其中粮食直补政策、购置农机补贴政策的满意度最高,77.97%的农户表示国家对各种粮食、良种、农机、家电下乡补贴的资金能够准确、及时发放,68.45%的农户认为他们能够明白发放金额。“一事一议”政策服务的满意度最低,尽管“一事一议”筹资必须召开村民大会,但48.7%的农户表示没有参加过村民大会。(5)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得分为61.24,处于基本满意水平。比较来说,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的满意度最高,次之为农村惠农政策服务,农村生产服务的满意度最低。

#### 四、实证分析

#####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理论假设,本文设定的计量模型为:

$$y_i = x_i \beta + z_i \gamma + \mu_i \quad (1)$$

其中, $y_i$ 表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得分, $x_i$ 、 $z_i$ 分别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构成的列向量, $x_i'$ 、 $z_i'$ 为各自的转置矩阵, $\mu_i$ 为扰动项。在扰动项协方差矩阵未知的情况下,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处理异方差可能失效,而“OLS+稳健标准误”的估计是稳健的,本文采用这一估计方法。

农户参与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把农户参与作为虚拟变量进行OLS回归,不能克服样本选择偏差与农户异质性问题。因此,本文把农户参与的三重维度作为解释变量,选择“农户对村务的了解程度”度量村务信息开放度与真实度,农户对村务情况越了解,村务信息开放度与真实度越高;采用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主体度量决策参与的广泛度,农村公共服务决策参与主体越多元化,决策参与的广泛度越高;以农户对村干落实公共服务的公开公正评价来度量村干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

此外,根据现有研究,<sup>[2][5][6][8][9]</sup>本文选取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村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个人年打工时间,家庭特征包括家庭成员、家庭耕地面积,村庄特征用村庄类型表示。具体变量的定义和说明见表2。

##### (二)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控制个体特征与村庄特征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因变量为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模型2—模型5的因变量分别是基础设施服务满意度、生产服务满意度、社会服务满意度以及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

表2 变量的定义与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定义
因变量	公共服务满意度	nps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总得分
解释变量	村务信息开放度	inform	农户对村务不了解=1,了解一点=2,一般=3,完全了解=4
	决策参与广泛度	dum_p	县乡政府=1,其他=0;村干部=1,其他=0;政府与农户一起=1,其他=0;农户=1,其他=0
	村干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	fair	不公开、公正=1,一般=2,公开、公正与透明=3
控制变量	性别	gender	女性=0,男性=1
	婚姻	marry	未婚=0,已婚=1
	年龄	age	农户实际年龄
	教育程度	edu	文盲=0,初中以下=1,高中=2,大专=3,本科及以上学历=4
	个人年收入	incom	5000元以下=1,5000-10000元=2,10000-20000元=3,20000元以上=4
	年打工时间	work	实际打工月份/12
	家庭成员	fam	家庭实际人口数
	家庭耕地面积	land	家庭总耕地面积(亩)
	村庄特征	village	城郊型农村=1,集镇中心村=2,偏远型乡村=3

农户参与维度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结果显示:(1)村务信息的了解程度对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生产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部分支持了假设1。原因可能在于村务信息的开放初步满足了农户的知情权,促进了农户了解农村公共服务的运作,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但另一方面目前的村务信息开放度与真实度不能满足农户低成本参与村级公共事务的需要,因为尽管国家出台了村务公开的具体政策,<sup>①</sup>但村务信息的开放度与真实度缺乏有效的监督,譬如村

务信息公开的时间、地点与形式没有考虑农户的流动因素,村务公开内容比较简单,取决于村干部的“道德良心”,农户甄别信息的真实度需要付出很大成本。有趣的是,村务信息的了解程度对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数量与质量容易测度,农户对村务信息越了解,越能发现基础设施服务的融资、生产、实施与监管问题,加大了对村务信息真实度的怀疑,降低了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的满意度。(2)与完全由农户进行公共服务决策相比,县乡政府(dum\_p1)、村干部(dum\_p2)、政府与农户

表3 农户参与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因变量: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				
	模型1 总体满意度	模型2 基础设施服务	模型3 生产服务	模型4 社会服务	模型5 惠农政策
inform	0.362 (0.420)	-0.358 (0.747)	0.118 (0.690)	0.194 (0.480)	1.493*** (0.525)
fair	1.560** (0.614)	3.078*** (1.079)	1.426 (1.049)	1.759** (0.744)	0.023 (0.766)
dum_p1	3.338 (2.920)	7.061** (3.486)	2.439 (5.188)	0.704 (2.977)	8.025* (4.527)
dum_p2	1.040 (2.872)	4.391 (3.444)	3.803 (5.162)	0.349 (2.849)	3.223 (4.389)
dum_p3	4.804 (3.032)	11.871*** (3.974)	4.181 (5.466)	1.410 (3.112)	10.118** (4.530)
gender	-0.398 (1.369)	-2.419 (2.047)	-0.074 (1.832)	0.899 (1.660)	0.000 (1.538)
marry	2.747 (2.150)	4.844 (3.421)	3.219 (2.976)	2.809 (2.259)	0.116 (2.247)
edu	-0.027 (0.712)	-0.429 (1.284)	-0.358 (0.966)	-0.325 (0.900)	1.005 (0.885)
fam	-0.897** (0.440)	-2.446*** (0.723)	-0.820 (0.605)	-0.304 (0.561)	-0.019 (0.552)
age	-0.023 (0.062)	0.070 (0.118)	-0.066 (0.094)	-0.059 (0.081)	-0.037 (0.078)
work	0.796 (1.577)	-2.330 (2.248)	2.617 (2.048)	1.830 (2.085)	1.068 (2.115)
incom	0.818 (0.711)	0.683 (1.036)	1.040 (0.916)	0.351 (0.835)	1.200 (0.941)
land	0.157 (0.144)	-0.038 (0.310)	0.223 (0.199)	0.091 (0.127)	0.352*** (0.133)
village	-0.043 (0.152)	-0.012 (0.034)	-0.041 (0.029)	-0.027 (0.043)	0.002 (0.254)
Cons	54.530*** (4.540)	59.884*** (7.867)	54.649*** (7.385)	55.586*** (5.066)	47.999*** (6.323)
样本量	290	290	290	290	290
调整 R <sup>2</sup>	0.175	0.216	0.117	0.0903	0.266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dum\_p3)都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政府与农户共同作为决策主体的影响系数最大,分别为4.804、11.871、4.181、1.410、10.118,并且对基础设施服务满意度、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而支持了假设2。村干部作为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主体的影响系数最小,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发现与廖媛红的研究结果不同。<sup>[1]</sup>其原因可能在于三方面。其一,对于农户来说,由于自身的公共理性以及自组织能力不足,特别是在公共服务决策过程中面临农户流动性大、支付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譬如外溢性较小的村级公共设施,仅有63.6%的农户愿意有限出资,出资份额不是根据农户对公共服务项目的需求意愿,而是平均承担。在现实困境的约束下,农户的公共需求偏好不能有效加总,农户自身达成一致同意的组织成本与决策成本很高,选择“农户决策”的农户不到1%。其二,与县乡政府相比,尽管村干部与农户直接打交道,更加了解农户的需求偏好,但村干部不是农村公共服务成本的承担主体,在集体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村干部决策并不能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可持续供给的承诺,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替代效应,因此,村干部决策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其三,政府与农户共同参与农村公共服务决策,既是对农户权利的尊重,达成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平等共识,又是政府对农户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的了解与回应,能够找到政府与农户之间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最大,但这种决策方式所占比例仅为7.17%,影响了估计系数的显著性。(3)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3。可能原因在于村干部是农村多数公共服务的宣传、组织与实施者,也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益者,“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村干部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与获益成为农户的参照对象,村干部在组织与实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各个环节中公开公正,农户获得公正对待的认知收益与体验收益越高,农村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就越高。

表3也报告了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年龄对农村生产服务、社会服务、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农户年龄的增长,对这些服务项目

的依赖程度和需求强度加大;农户教育程度对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生产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伴随农户受教育程度的上升,农户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期望效用相应提高,拉大了同等水平公共服务的预期效用与实际感受差距。农户年龄与教育特征变量的研究结果与国内现有的研究基本一致。<sup>[2][9][10]</sup>值得一提的是,农户教育程度与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正相关,可能原因在于农户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惠农政策服务对“三农”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农户收入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为正,这与廖媛红的研究结论相反;<sup>[9]</sup>农户打工时间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是农户年打工时间越长,一方面更能感受当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纵向改进,另一方面更有机会比较各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其中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的横向差距更加明显;此外,农户性别、婚姻状态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一结果与Olken、朱玉春等以及Beath等的研究基本一致。<sup>[7][8][10]</sup>

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家庭人口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可能原因在于家庭人口越多,对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依赖性越大,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长期不匹配的失落与无助感越强,满意度越低。家庭耕地面积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正相关,可能原因在于耕地面积越大,相应的政策补贴越多,满意度越高。从村庄特征来看,村庄类型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负相关,但不显著,可能原因是与偏远型农村相比,城郊型农村和集镇中心村的与县乡政府的政治距离较近,具有更大的边际政治影响力,能够获得更高的公共服务投入,但城郊型农村和集镇中心村的流入人口更多,农村公共服务的拥挤成本更高,因此村庄类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 (三)稳健性检验

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农户对农村某项公共服务的主观评价,农户可能因为锚定效应、认知失谐或者策略性动机而做出低评或高评。为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本文的处理方法是把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重新进行排序,<sup>②</sup>然后采用有序Probit模型检验农户参与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表4

报告了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 1—模型 5 可以看出,有序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 OLS 估计结果大致相同。具体来说,农户对村务信息的了解程度对农村各类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变小,分别为 0.013、0.005、0.058、0.077、0.181,但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变化;与农户单独决策相比,县乡政府决策、村干决策、政府与

农户共同决策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变小,其中政府与农户共同决策的影响系数仍然最大,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没有变化;村干部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fair)对各类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同样没有变化。此外,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村庄特征变量的系数符号与 OLS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模型的结论是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因变量: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				
	模型 1 总体满意度	模型 2 基础设施	模型 3 生产服务	模型 4 社会服务	模型 5 惠农政策
inform	0.013 (0.090)	0.005 (0.087)	0.058 (0.087)	0.077 (0.091)	0.181** (0.091)
fair	0.319** (0.141)	0.247* (0.134)	0.155 (0.132)	0.235* (0.139)	0.004 (0.137)
dum_p1	0.972 (0.771)	0.878 (0.739)	0.122 (0.765)	0.011 (0.776)	0.728 (0.736)
dum_p2	0.517 (0.764)	0.605 (0.734)	0.522 (0.762)	0.092 (0.772)	0.057 (0.728)
dum_p3	1.059 (0.818)	1.225 (0.788)	0.470 (0.814)	0.077 (0.824)	0.955 (0.795)
gender	-0.020 (0.245)	-0.285 (0.239)	-0.082 (0.240)	0.105 (0.247)	-0.097 (0.241)
marry	0.640 (0.390)	0.313 (0.383)	0.680* (0.395)	0.384 (0.404)	-0.183 (0.396)
edu	-0.008 (0.141)	-0.036 (0.135)	-0.031 (0.137)	-0.040 (0.142)	0.151 (0.141)
fam	-0.167** (0.078)	-0.215*** (0.076)	-0.137* (0.077)	-0.029 (0.079)	0.023 (0.076)
age	-0.004 (0.013)	0.009 (0.013)	-0.021 (0.013)	-0.002 (0.014)	-0.000 (0.013)
work	0.072 (0.278)	-0.214 (0.269)	0.245 (0.273)	0.256 (0.280)	0.092 (0.271)
incom	0.089 (0.114)	0.086 (0.110)	0.028 (0.113)	0.139 (0.116)	0.125 (0.114)
land	0.020 (0.027)	-0.017 (0.023)	0.012 (0.024)	0.024 (0.029)	0.035 (0.027)
village	-0.014 (0.112)	-0.019 (0.034)	-0.011 (0.020)	-0.017 (0.023)	0.001 (0.054)
cut3	3.985*** (1.181)	2.953*** (1.065)	2.089* (1.120)		4.011*** (1.128)
cut1	-1.276 (1.109)	-1.481 (1.042)	-2.184** (1.074)	-1.587 (1.145)	-0.561 (1.070)
cut2	0.909 (1.087)	0.384 (1.034)	0.208 (1.061)	1.149 (1.100)	1.186 (1.068)
chi2	20.84	24.46	20.05	11.33	31.28
样本量	290	290	290	290	290
R2_p	0.0901	0.0946	0.0822	0.0521	0.120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

稳健的。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户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受益对象,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有效参与的三重维度,并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现状,检验了农户参与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的总体满意度不高,处于基本满意水平。比较来说,农村基础设施服务的满意度最高,次之为农村惠农政策服务和农村社会服务,农村生产服务的满意度最低。四类公共服务中满意度最低的项目分别是农村饮水工程、农技推广与培训、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一事一议”政策。(2)农户有效参与必须具备三重维度,分别是村务信息的开放度与真实度、决策参与的广泛度以及村干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这三重维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村务信息开放度与真实度对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农村生产服务、社会服务以及农村公共服务总体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政府与农户共同作为决策主体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系数最大,并且对基础设施服务满意度、惠农政策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个体特征来看,农户收入、年打工时间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教育程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农户性别、婚姻状态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农户家庭特征来看,家庭人口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负相关,家庭耕地面积与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此外,村庄类型对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促进农户有效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持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理性选择。因此,未来政策着力点应从四方面努力。首先,提高村务信息的开放度与真实度。村务公开是鼓励农户了解农村公共事务的政策,但仍有55.19%的调查农户不了解村务公开,因此各地政府应该加大对村务公开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支持力度,把村务公开列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村务公开无死角。另一方面要求村务公开内容明白易懂贴近农户关心的公共服务问题,加强对村务内容真实性的审计与

监督,避免村务公开流于形式。此外,积极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鼓励乡镇政府利用网络或新媒体定期公开当地村务信息,降低外出农户了解村务信息的成本。其次,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决策参与的广泛度。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农户的主体性地位,建立村庄议事会和监事会制度,赋予农户平等参与公共服务决策的权利;加大对农户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财力支持,引导农户有序参与;降低乡村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从制度、财力以及人力上扶持乡村公益组织的健康成长;提高各级政府官员以及村干组织农户参与服务决策的意识和能力,构建以政府、村干、农户以及乡村公益组织共同参与公共服务决策的新型乡村治理关系。再次,提高村干职务行为的公正透明度。一是本文调研发现,农户最担心和反映最大的问题是村干腐败,因此从制度上加强对村干职务行为的约束,严格执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加大对村干违规与寻租行为的查处力度。二是建立村干工作绩效的激励机制,提高村干的工作报酬和误工补贴,逐步完善村干的各项社会保险,充分调动村干工作积极性。三是提高村干对中央政策、法律法规的认知力,加大对村干的学习培训力度,把村干培训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行专款专用。四是加大对村干职务行为的监督力度。最后,培育农户的公共理性和自组织能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向需求诱致性转变。

### 注 释:

- ① 譬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1998]9号文件)规定了村务公开的内容和方法,2011年农业部、监察部发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规定》(农经发[2011]13号文件),规定了农村财务公开内容(包括8大类、44小项)、财务公开的时间、形式和监督方式。
- ② 根据满意度得分进行五级排序,即20以下=1,20~40=2,40~60=3,60~80=4,80~100=5。

### 参考文献:

- [1] 郑卫荣.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分析与对策选择[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11,(1):74-81.
- [2] 李冰冰,王曙光.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户参与和乡村治理[J].经济科学,2014,(4):116-128.
- [3] 钱文荣,应一.农户参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39-51.



- [4] Devereux P J, Weisbrod B A. Does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Public Services Affect Complaints (Voice) and Geographic Mobility (Exit)? [J]. *Public Finance Review*, 2006, (2): 123-147.
- [5] 朱玉春, 唐娟莉, 等.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 (2): 82-91.
- [6] 李燕凌, 曾福生. 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8): 3-18.
- [7] Olken B A. Direct Democrac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onesia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2): 243-267.
- [8] Beath A, Christia F, Enikolopov R. Direct Democra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Afghanistan [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5.
- [9] 廖媛红. 制度因素与农村公共品的满意度研究[J]. *经济社会比较*, 2013, (6): 121-132.
- [10] 朱玉春, 唐娟莉, 等.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果评估: 来自农户收入差距的响应[J]. *管理世界*, 2011, (9): 74-80.
- [11] 方建中. 农户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研究[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1, (6): 56-60.
- [12] Tewdwr-Jones M. Rural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Planning Role of Community Council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 51-62.
- [13] Hammell W. Quality of life, Participation and Occupational Rights: A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J]. *Australian Occupational Therapy Journal*, 2015, (2): 78-85.
- [14] Akerlof G A, Kranton R E. Economics and Identit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3): 715-753.
- [15] Hudson J.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the EU [J]. *Kyklos*, 2006, (1): 43-62.
- [16] Harrebye S, Ejrnæs A. European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How Dissatisfaction Motivates Extra-Parliamentary Activities Given the Right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J].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015, (2): 151-174.

(责任编辑: 卢君)

## Farmers' Participation Dimension and Puzzle of Satisfaction in Rural Public Service

ZHANG 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Bengbu Anhui 233030, China)

**Abstract:** The puzzle of satisfaction in the rural public service is the current problem of rural governance. Ba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participation dimension and satisfac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is not high which is at a basic level of satisfaction. The degree of village information openness and authenticity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servic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has no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degree of rural production services, social services and rural public service;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armer which are as a subject of the main decision-making has maximum influence coefficient on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and agricultural policy service; The transparency of village duty behavior of justice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satisfaction degree of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village characteristics on rural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degree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degree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rural public service; satisfaction degree; farmers' participation dimension